第 59 卷 第 3 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59, No.3
2022 年 5 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May 2022

哲 学 研 究

《近思录》的道学体系与思想特色

朱 汉 民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 长沙 410082)

摘　要:《近思录》是朱熹通过道统谱系以建构道学体系的尝试。《近思录》由两部分构成:道之体与道之用,合起来就是所谓“内圣外王之道”的道学体系。《近思录》首篇“道体”是形而上意义的哲学思辨,终篇“圣贤气象”是得道的形而上精神境界,首尾均以“道体”呼应贯通,体现出道学的学术旨趣与思想特色。《近思录》中间的十多篇均是“道之用”,即是形而下意义的行道工夫与礼乐刑政,可以详细了解道学之大用。《近思录》确立的道学体系,在道学建构有重要开拓意义,对后学编辑《朱子语类》《性理大全》《朱子大全》产生历史影响。

关键词: 朱熹;《近思录》;道学体系;道统谱系
中图分类号:B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2)03-0005-09

道学体系的建构与完成,需要梳理、确立两个重要的脉络:其一,纵贯的历史传承脉络,是从宋代道学家授受脉络的学统,提升出从尧舜文武、孔曾思孟、周程张朱的道统脉络;其二,横贯的学术体系脉络,也就是将道学梳理成一种学术体系,建构一套包括形上道体、心性工夫、礼乐刑政、超然境界的体系化道学。朱熹作为道学的集大成者,为此做了十分重要的奠基工作:前者是朱熹于乾道八年(1172)编撰《伊洛渊源录》,该书就是从纵贯历史的宋儒学统中确立道统;后者是朱熹、吕祖谦编撰《近思录》,该书进一步从道统中确立横贯理论体系的道学。

《近思录》虽然是朱熹、吕祖谦合编,但是正如许多学者所认定的,朱熹无疑起了主导作用。而且,《近思录》与《伊洛渊源录》有着密切的关联性。两部书合起来,才构成朱熹希望完成的最大学术任务,通过对北宋儒学的总结,完成道学的集大成建构。

一、《近思录》学术体系与“道体”

《伊洛渊源录》是首次以学统建构道统谱系的尝试,而《近思录》则是朱熹首次从道统谱系以建构道学体系的尝试。这两部书在学术史上均有很重要的地位和很深远的影响。如果说《伊洛渊源录》确定了宋学史的书写,奠定了《宋史》《宋元学案》《学统》的道统学术脉络的话,那么,《近思录》则确立了道学思想体系,同时对《朱子语类》《性理大全》《朱子大全》的体系框架同样产生深刻影响。

朱熹一直将道学、道统的建构看作是自己毕生的事业和崇高的目标,并特别希望道学群体能够就此问题达成共识。南宋乾道八年(1172)朱熹开始编撰《伊洛渊源录》,这是他首次将宋代学统与道统谱系结合的尝试。书稿编成之后,朱熹请吕祖谦为之作序,其实是希望获得自己朋党对道统的共识,但是吕氏因观点差异没有完成朱熹的请求。淳熙二年(1175)朱熹约请吕祖谦于寒泉精舍留止旬日,二人相与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希望进一步探寻、获得对道学的共识。为了继续道学体系的建构与完成,朱熹倡议编一本系统的道学读物,作为学习道学的入门书。他们往复商量,最终共同编出《近思录》一书。

收稿日期:2022-01-15
作者简介:朱汉民,男,湖南邵阳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宋学源流”(项目编号:19ZDA028)。

按照朱熹的说法,此书“盖凡学者所以求端用力、处己治人之要,与夫所以辨异端、观圣贤之大略,皆初见其梗概”①,其实就是一部道学体系的重要著作。在《近思录》之前,中国学术史上还很少有体系化的学术著作,哲学家、思想家的理论主要是通过注释经典、学术对话、具体问题的论述等,很少有遵循内在逻辑结构的体系化表述方式。学者们发现并指出,《近思录》一书的“最大特色即在于它的体系性”②。

应该注意的是,《近思录》的“体系性”还不是一般意义的思想体系,而是代表儒学理论化、哲学化最高发展阶段的道学体系。本来,宋学的目标是复兴早期儒学,特别是重建儒学的内圣外王之道。宋学学派形成多元化学统,而且都以为自己本派的学说才是儒学正统的代表。但是,在诸多学统中,只有二程、张载等人明确将自己的儒学体系看作是“道学”,即真正传承从三代先王到早期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周、张、二程不断讲述自己领悟的道学,他们的道学既十分超然,上达于太极太虚天道天理;又十分务实,下学于生活日用家国天下。所以,道学既需要有致广大的宏大学术视野,又需要有尽精微的严谨学术辨析。但是,对于那些有志于道学的初学者来说,学习这样宏大复杂的学术思想都会感到很困难。如何使道学清晰化、系统化并使学者易于掌握,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重要问题。

《近思录》建构的道学体系,首先是具有纵观意义的传道意义。作为传承三代圣王、早期儒家的“道学”,无疑会涉及宋代道学与三代圣王之道、先秦孔孟之道的关系。朱熹的立意十分明确,宋代道学传承了上古先王之道、先秦孔孟之道。陈淳曾记录下朱熹谈论《近思录》的话:“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③这段话十分鲜明地表达了朱熹对于《近思录》《四书》《六经》之间关系的看法,进一步明确了周张二程与孔曾思孟、尧舜文武之间的关系。这一段话的思想核心仍然是道统论,即周张二程所讲述的道学来自于孔曾思孟,而孔曾思孟的道学来自于尧舜文武。但是,这一段话还表达了一个重要思想:宋代的学者如果要了解尧舜文武之道,必须通过孔曾思孟的思想诠释;而要了解孔曾思孟之道,就必须通过周张二程的道学。质而言之,《近思录》记录的不仅仅是北宋的道学体系,同时还进入尧舜文武、孔曾思孟的全部儒家思想大厦的门径。

《近思录》虽然摘录北宋周二程张的学术言论,但是其关键是将这些言论纳入到朱熹、吕祖谦建构的学术体系之中。尽管全书的内容来自北宋道学家,但是重要的是全书建构的道学体系。关于道学体系问题,一直是现代学者研究、争论的一个问题。由于现代学术研究道学者特别希望挖掘道学中的“哲学”思想,所以将道学等同于理气、心性的“哲学”问题。但是我们如果从《近思录》的体系去考察宋儒的道学体系,会发现宋儒的道学体系的思想内涵比现代哲学史论述的内容丰富得多。这里不妨看看《近思录》的纲目篇名:

> 一、道体;二、为学大要;三、格物穷理;四、存养;五、改过迁善,克己复礼;六、齐家之道;七、出处、进退、辞受之义;八、治国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处事之方;十一、教学之道;十二、改过及人心疵病;十三、异端之学;十四、圣贤气象。④

不少学者认为,《近思录》与《大学》在体系上有相通之处,即都是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思想体系。但是,应该指出《大学》的“规模”又有不同于《近思录》之处,《大学》主要是“入德之门户”,故而以“格物致知”始,以“治国平天下”终;而《近思录》是道学的思想体系,是以天人依据的“道体”始,中间才是“修己治人”的工夫步骤与礼乐制度,最后以达到天人境界的“圣贤气象”终。也就是说,朱熹已经提出《大学》是一种“为学次第规模”的工夫论框架,即如朱熹曾经提出:“《大学》一篇乃入德之门户,学者当先讲习,

---

① 朱熹:《近思录·朱序》,《朱子全书》第 13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第 163 页。

② 李祥俊、贾椏钊:《〈近思录〉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体系结构》,《哲学研究》2014 年第 9 期,第 40 页。

③ 黎靖德:《朱子语类》卷 105,《朱子全书》第 17 册,第 3450 页。

④ 黎靖德:《朱子语类》卷 105,《朱子全书》第 17 册,第 3450 页。

知得为学次第规模,乃可读《语》《孟》《中庸》。”①而《近思录》才是道学思想体系的框架,即体现为完整的“内圣外王之道”思想体系与规模。在《近思录》的道学体系中,开篇的“道体”恰恰体现出宋儒的学术创新与理论基石,收篇的“圣贤气象”又体现出宋儒的人生境界与终极关怀。

所以,《近思录》整体可以看作是由两部分构成:道之体与道之用。第一篇名“道体”,即是我们经常讲的“形而上”哲学意义的理学;第二篇以后的十多篇均是“道之用”,即是偏重于“形而下”意义的修道工夫与礼乐刑政。而最后的“圣贤气象”则是学者达到与道一体的精神境界。从大类来说,“圣贤气象”与“道体”是同一“道体”的两个方面,“道体”是论述“道”本体的客观自在面向,而“圣贤气象”则是通过修道工夫而实现“道”的主体自为面向。“道”与“圣人”二者之间本来就是相通的,正如《朱子语类》所载朱子语:

> 先生因论苏子由云:“‘学圣人,不如学道’,他认道与圣人做两个物事,不知道便是无躯壳底圣人,圣人便是有躯壳底道。学道便是学圣人,学圣人便是学道。如何将做两个物事看!”②

北宋诸儒均是以“道”为学术目标,其实也是以成圣为学术目标。在朱子《伊洛渊源录》《近思录》之前,早就出现过《诸儒鸣道集》,就是记载宋儒对道学的追求,其实也是对成圣的追求。

所以,《近思录》卷首以“道体”开篇,是道学体系的需要,但是这一本道学的初学读物以如此艰深问题开篇,确实是让人望而生畏的。吕祖谦在为《近思录》写的序中对此作了说明:

> 《近思录》既成,或疑首卷阴阳变化性命之说,大抵非始学者之事。祖谦窃尝与闻次缉之意:后出晚进,于义理之本原虽未容骤语,苟茫然不识其梗概,则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义,有所向望而已。至于余卷所载讲学之方、日用躬行之实,具有科级。循是而进,自卑升高,自近及远,庶几不失纂集之指。③

吕祖谦对此解释很清楚,因道学体系的需要,只能够将“道体”列入开篇;但是从初学者修身工夫而言,则应该“自卑升高,自近及远”。程朱的学说既可以称之为“道学”,也可以称之为“理学”。当他们将自己的学术称之为“道学”时,显然是为了凸显自己在承担、传承有着悠久来源的价值体系与天人秩序。

二、《近思录》的道之用

尽管《近思录》的首卷和尾卷均是属于道之体,是道学的理论核心和思想基础,但是《近思录》的主体内容恰恰是道之用,是修道工夫与经世实践。由于各种原因,现代学术描述的道学、道学家,主要是将《近思录》首卷的道之体,看作是其学术体系的主要内容,凸显了他们作为“哲学家”的身份,但是他们作为儒家思想的特点却模糊淡化了。但是,一旦回到《近思录》的思想体系,就会发现原来对道学家的印象不一定是全面的。

尽管《近思录》首卷以“阴阳变化性命之说”论“道体”,但是如果进一步思考、挖掘宋儒之“道”的历史根源,会发现其“道”有十分深厚的历史根源。当然,道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上古三代时期或者更早,但是作为成熟的儒家之道出现,却应该是在春秋战国的哲学突破或轴心文明时期。那一个时代尽管是诸子百家,但是诸子的道哲学无非是两大学派。一派将“道”理解为自然,即非人力而然的“必然”法则,这一派的代表是道家老庄;一派将“道”理解为人文,即人类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实现的“应然”目标,这一派的代表是儒家孔孟。但是,儒道两家的发展过程中,却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道家,特别是新道家,他们会将“必然”法则的“道”看作是治国与治生的“应然”目标,这就是汉初的黄老之学与魏晋的玄

---

① 朱熹:《与陈丞相别纸》,《朱文公文集》卷 26,《朱子全书》第 21 册,第 1180 页。

② 黎靖德:《朱子语类》卷 130。《朱子全书》第 18 册,第 4059 页。

③ 吕祖谦:《近思录·吕序》,《朱子全书》第 13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 165 页。

理。而宋代新儒家的主要学术使命,就是要将“应然”目标的“道”,看作是人们必须遵循的“必然”法则。《近思录》首卷的“道体”,其基本学术任务,就是将早期儒家看作是“应然”目标的仁义之道、忠恕之道、中庸之道,统统论证为源于必然法则的天道。“道体”卷所要完成的学术任务,就是这一具有形而上意义的道。

宋代士大夫虽然能够在“道体”一卷将儒家“应然”的价值目标,论证成天理的“必然”法则。但是,他们也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论证“应然”的价值目标是“必然”法则还只是一种理论,真正的难点是在现实世界完全去实现道的“应然”价值目标。所以,“道体”只要一卷即可,而实现道体的道之用、道之术,则需要长期的修炼工夫,故而是最为艰难的任务。《近思录》花十多卷篇幅,从为学大要、格物穷理、改过迁善,讲到治国平天下、君子处事之方等,其目的均是告诫人们如何去实现所当然的人文目标。可见,宋儒的“道学”体系,既包括这一套“应然”的价值体系为什么是“必然”的宇宙法则,又包括如何去实践这一套应然的价值和规范,这就是现实世界的修身工夫和礼乐刑政。

可见,朱熹等宋儒的道学体系尽管很复杂和庞大,但是核心思想仍然是和春秋时代的孔子一样,希望解决“天下无道”的问题,实现这一宏愿的基本路径也是“修己以治人”,即希望从内圣的修己到外王的治国,最终建立一个合乎“道”的理想世界。所以,《近思录》展开的主体内容,就是如何去实现应然之道的方法、路径,道之用、道之术总是会比道之体更需要儒者的努力。如果要将《近思录》的道术作一分类,可以分为内圣的心术与外王的治术。内圣的心术包括前面几卷如为学、格物穷理、存养、改过迁善、克己复礼等等;外王的治术包括后几卷如齐家、出处、进退、辞受、治国平天下、制度、处事等。值得注意的是,《近思录》的内圣心术与外王治术是密切联系的。根据余英时的说法:“作为一整体而言,‘内圣’和‘外王’是一连续体,绝对不能分割成两截。”①故而可以将二者结合起来考察。

宋初儒学复兴,宋儒都是希望振兴士大夫精神,重新建构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但是宋学学统四起,他们的主要差别是什么呢?尽管宋儒均认为自己在讲内圣外王之道,其实其内部可以分为内圣主导型和外王主导型。内圣主导型群体中重视人性与天道的形而上学的依据,故而又可以分为理学、气学、心学、性学的不同哲学学派。而外王主导型重视国家治理的制度、方略,其学术贡献主要是政治、经济、军事等实用的学科。北宋时期有荆公新学与二程洛学两大学派,就是典型的外王主导型与内圣主导型的不同学派。这里重点探讨《近思录》的内圣外王之道,故而从下述两个方面进一步论述其道之用。

根据道学的思想体系,首先考察《近思录》有关内圣之道的心术。从第二卷到第五卷,主要是为学、格物穷理、存养、改过迁善的内圣修身工夫,这四卷均是从内圣修身工夫开始。如第二卷包括周敦颐的“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程颢的“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程颐的“君子主敬以直其内,守义以方其外”,张载又“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②。第三卷、第四卷是格物穷理、存养方面的内圣工夫。直到第五卷的“改过迁善”仍然是内圣工夫,如周敦颐“君子乾乾不息于诚,然必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而后至”;程颐作《四箴》而期望“后之学圣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程颢“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惧”;张载“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丧本焉尔”③。在这四卷中,摘录的均是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四位道学家关于内圣工夫的思想内容。关于内圣修身的工夫论,确实是道学家的强项。他们一方面大量吸收传承早期儒家的思想,如上述的修身工夫就往往来自《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易传》,充分

---

① 余英时:《我摧毁了朱熹的价值世界吗?》,《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年版,第 882 页。

② 朱熹:《近思录》卷二,《朱子全书》第 13 册,第 176—187 页。

③ 朱熹:《近思录》卷二,《朱子全书》第 13 册,第 219—224 页。

继承了早期儒家格物穷理、存心养性等修身工夫;另一方面又从佛道的心性修养中吸收了许多思想营养,进一步提升了他们修身工夫的实际效果和精神境界。

从第六卷开始,朱熹进一步选取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相关的政教制度、理政处事之方的思想和言论。与许多现代学者理解不同的是,朱熹、吕祖谦选取的内容很多很广,可见道学家并不是一批偏执于心性的腐儒,对治国平天下同样十分关注并有独特见解。他们确实是一批关注"内圣外王之道连续体"的儒家士大夫,希望从内圣工夫出发,最终推动外王治理的目标完成。所以,《近思录》以很大篇幅来讨论治国平天下与相关礼法政制、理政处事,其实就是宋代道学思想追求的必然结果。但是,在大量研究宋代道学的论著中,往往会出现两种不同的片面性观点。一种片面性就是将道学思想简约或等同为内圣之道,认为宋代道学就是一种内圣之道,其全部思想就是内圣之本与内圣工夫,包括一套从天理到心性的所谓性理之学,以及如何成圣的方法和路径。牟宗三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他在《心体与性体》一书中,就是将宋代道学完全视为一种内圣之学,提出道学的内圣之本就是一种"道德底形而上学",道学的工夫论就是对内在心性的"逆觉体证"的方法。另一种片面性就是将程朱道学与荆公新学等同起来,认为他们均是在讲"内圣外王之道连续体"的儒家士大夫,他们并没有实际的区别。如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将朱熹看作是王安石之学的继承者,将朱熹时代看作是"后王安石时代"。如果考察《近思录》中内圣外王之道的思想特点,就会发现:道学确实不是一种片面的内圣之道,其"内圣外王之道连续体"中包含了丰富的外王之道的思想;但是道学也不是与荆公新学、事功学派没有区别的儒学,他们对内圣之道的片面强调,有时甚至以内圣之道取代外王之道。

在《近思录》的第六卷至第十二卷的大量篇幅中,可以看到道学家的强烈经世致用的思想追求,并且对于治国平天下以及政教、制度、治术均有一套独特的看法和见解。可以发现,《近思录》记载的道学家经世方案,总是特别强调内圣决定外王的思想路线,故而在有关治国理政方面,仍然离不开"修己治人"的一贯思想。在他们的"内圣外王之道连续体"之中,一直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内圣"绝对处于优先、主导的地位,而明显不同于荆公新学、事功学派的内圣外王之道。这里,我们可以将《近思录》记载的道学派与荆公新学的内圣外王之道做一个比较。荆公新学更为关注经世务的外王之道,追求"积弱之后而欲济之以富强"的经世致用目标,故而从《尚书》《周礼》《诗经》等先王政典探寻礼乐制度、治理方法的依据,以解决熙宁新政的现实政治问题。尽管荆公新学也关心内圣之道,但主要目的是凸显政治睿智、强力意志的精神因素,其内圣之道直接依附于外王之用。但是,根据《近思录》记载的道学家言论,他们只认可内圣决定外王,总是偏重道德为本的内圣之道,将内圣的修身工夫作为新儒家道术的主导,进而深刻影响、决定了他们的外王之道术。如《近思录》卷八是"治国平天下之道",其内容包括:

> (周敦颐)治天下有本,身之谓也;治天下有则,家之谓也。本必端,端本,诚心而已矣;则必善,善则,和亲而已矣。①
>
> (程颢)故诚心而王,则王矣;假之而霸,则霸矣。②
>
> (程颢)治道亦有从本而言,亦有从事而言。从本而言,惟从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③
>
> (张载)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忧者。④

可以发现,道学家的治国平天下之道,主要是"诚心""仁爱""中庸"的内圣之道。他们认为解决了内圣之道的问题,其外王之治的问题就抓住了纲目、根本。强调以内圣之德为本,将内圣的诚心、修身拓展道

---

① 朱熹、吕祖谦:《近思录》卷八,《朱子全书》第 13 册,第 241 页。
② 朱熹、吕祖谦:《近思录》卷八,《朱子全书》第 13 册,第 241 页。
③ 朱熹、吕祖谦:《近思录》卷八,《朱子全书》第 13 册,第 246 页。
④ 朱熹、吕祖谦:《近思录》卷八,《朱子全书》第 13 册,第 247 页。

外王的治国、政术,确实是道学派不同于荆公新学的最大特点。

正因为如此,道学的外王之术也往往受到后世的批评指责,认为道学的贡献只是其内圣之道的意义,而对现实政治并无贡献。其实,在《近思录》关于外王之术的大量篇幅中,还是可以发现道学家对于外王的政制、治术均有一套独特的看法和见解,其中许多思想中确实还能够在政治领域切中时弊,还有一些思想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里只举两个例子。其一,关于限制君权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政治系统中,掌控国家最高权力的是君主,而国家兴衰治乱的原因也与君主权力有直接关系。君主权力旁落会导致动乱,而君主权力集中又可能导致专制也可能引发动乱。《近思录》引述了四位道学家的言论,表达出他们对限制君权的政治智慧。他们虽然认可君权在国家政治制度方面的重要性,但是同时特别强调对君权的限制。他们提出以“天理”限制君权,不仅仅是一种道德说教,还有着制度方面的思考和安排。譬如,程颐以三代官制为典范,希望宋代政制能够仿效以限制君主,他说:“三代之时,人君必有师、傅、保之官。师,道之教训;傅,傅之德义;保,保其身体。后世作事无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规过而不知养德。”①程颐还从现实出发,希望以宋代的经筵制度承担、完成三代师、傅、保之官的职责,解决现实君王权力的理性运作。程颐还提出一个重要的政治思想:“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②可以发现,道学派一方面希望通过经筵讲学的机会,解决“正君心”的根本问题,以实现“君德成就”的目标;另一方面他们又主张强化宰相的行政权力,以限制君主对国家大权的独揽,实现儒家天下有道的治理秩序。

其次,道学家特别注意民间社会的治理问题,并且突破历史上的“礼不下庶人”的规矩,开始推动民间社会治理,特别是将宗族制度建设、礼义教化推广全面展开,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近思录》就保留了北宋道学家在这方面的许多思想言论。如程颢提出国家治理的“十事”,即“一曰师傅,二曰六官,三曰经界,四曰乡党,五曰贡士,六曰兵役,七曰民食,八曰四民,九曰山泽,十曰分数”③。这“十事”中的绝大部分属于基层社会、民生问题、礼义教化的问题。道学家在不能够获得在朝的行政权时,就努力推动民间社会的治理。如张载就推动民间宗族以及礼义推广的工作,他说:“管摄天下之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需是明谱系,收世族,立宗子法。”④《近思录》选取的道学家政治思想,其实仅仅是很少的一部分,但是确实体现了道学家在这一问题上的重要思想贡献。

三、“圣贤气象”与道统论

朱熹、吕祖谦编《近思录》,以“道体”为全书之开篇,为儒家价值确立一个形而上的依据;又以“圣贤气象”为全书之终,为道学确立一个道统论的谱系。本来,《近思录》是希望建构一个完整的内圣外王之道的道学体系,这一体系为什么要以“道统”开端,又以“圣贤气象”结束?“圣贤气象”与道学、道统有什么思想关联?

《近思录》以“圣贤气象”为全书终篇,其实也包含着一个重要的思想寓意:道学家已经将完整的内圣外王之道,浓缩到其中他们认为更为关键的内圣之道;又将内圣之道的丰富思想,凝聚为一种内外融通的精神境界即“圣贤气象”。为什么会是这样?其实这与唐宋时期儒家面临佛老之学的挑战有密切关系。《近思录》在“圣贤气象”卷之前,专门列有“辨异端”一卷,显然,在讲完“内圣外王之道”之后,《近思录》将“辨异端”与“圣贤气象”列入全书最后,恰恰是二者有密切的相关性。

---

① 朱熹、吕祖谦:《近思录》卷九,《朱子全书》第 13 册,第 250 页。

②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文集》卷 6,《论经筵第三劄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540 页。

③ 朱熹、吕祖谦:《近思录》卷 9,《朱子全书》第 13 册,第 250 页。

④ 朱熹、吕祖谦:《近思录》卷 9,《朱子全书》第 13 册,第 252 页。

《近思录》的“辨异端”卷,其首章引明道先生语:“杨墨之害,甚于申韩;佛老之害,甚于杨墨。”①明道为何会说“佛老之害,甚于杨墨”? 其实,早期儒家的论敌是杨墨、申韩之学,经过孟子辟杨墨的思想论战,已经在汉唐以来思想界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但是,唐宋时期的思想界,佛老之学正盛,其原因正如明道所说:“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杨墨之比,此所以为害尤盛。”②明道之所以会认为佛老之学“近理”,恰恰是因为其一套“形而上”意义的哲学思辨和精神境界,对唐宋时期的士大夫有着巨大精神吸引力。人们会发现,程颢往往是在批判佛教的同时又说佛学近理。如佛学有思辨性强的形而上学,恰恰是儒学的不足,所以程颢说:“佛氏不识阴阳、昼夜、死生、古今,安得谓形而上者与圣人同乎?”③同时,佛老之学追求一种超越得失、生死的天地一体的精神境界,其实也是儒学既要学习又要严格划清界限的地方,所以程颢说:“所以谓万物一体者,皆有此理,只为从那里来。……释氏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却厌恶,要得去尽根尘,为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④道学家承认佛老这些思想“近理”,对读书人有极大的影响力、吸引力;但是这些思想又极为有害,宋儒必须寻求一种既相似又不同的替代物。

所以,宋儒最后以“圣贤气象”作为《近思录》的最后一卷,是合乎其思想体系与逻辑体系的。《近思录》以宇宙与人生的终极依据——“道体”开端,继而以内在修身与外在经世展开体认、实践道体的工夫与治术,而内在修身与外在经世的完美实现,最终就会体现为一种“圣贤气象”的精神境界,当然,这是就《近思录》的思想逻辑而言。如果就历史进程来说,却可能是相反的过程。历史上儒家士大夫一直面临入世与出世、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人生选择,魏晋的名士风度、隋唐的禅修境界也一直是儒家士大夫的精神诱惑。到了北宋初年,儒家士大夫希望通过挖掘早期儒家的“孔颜乐处”,以取代佛老之学的精神境界。所以,北宋初年,儒家士大夫之中流行一种特别的人格理想与精神境界,就是所谓的“圣贤气象”。宋儒的“圣贤气象”包括两个重要方面:社会责任与个人自在、忧患意识与闲适心态、道义情怀与洒落胸襟。这两个方面原本是一种紧张关系,东汉儒家士大夫为表达自己的社会责任、忧患意识、道义情怀而与宦官、外戚政治集团展开殊死搏斗,不仅放弃了个人的自在、闲适,甚至放弃了自由和生命,而魏晋名士、隋唐士大夫往往过于追求个人的身心自在、闲适心态、洒落胸襟,又走向对名教的悖逆和行为的放荡。宋代士大夫的“圣贤气象”却希望将两者结合起来,并且希望为此建构一套身心安顿的宇宙哲学与修身工夫。⑤ 因此,“圣贤气象”“名教可乐”等问题其实一直是建构道学理论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成为许多宋儒,特别是濂、洛、关、闽等著名道学家的相传之要,体现出这一问题意识是道学建构的思想开端与理论原点。

现在需要进一步解答《近思录》终篇如何以“圣贤气象”来建构“道统论”的问题。周敦颐、二程、张载究竟凭什么能够传承从尧舜禹汤到文武周公的道统? 宋儒是如何将孔颜曾孟之后已经断绝的道统传承下来? 这既是道学面对的最重要学术问题,也是最难解说的学术难题。本来,《近思录》认可的道学应该是体用兼备的,即“道体”一定是“精粗本末、宾主内外,盖有不可以豪发差者”⑥。《近思录》在首卷讲完道体之后,就立刻在后来各卷中全面展开内圣外王之道的论述,既有为学、格物穷理、存养、改过迁善、克己复礼等修道工夫;又有齐家、出处、进退、辞受、治国平天下、制度等行道治术。这一完整的内圣外王之道来源于三代圣王和《六经》文献,而朱熹、吕祖谦所要表彰的宋代道统传人是周张二程,他们不

---

① 朱熹、吕祖谦:《近思录》卷 13,《朱子全书》第 13 册,第 277 页。
② 朱熹、吕祖谦:《近思录》卷 13,《朱子全书》第 13 册,第 277 页。
③ 朱熹、吕祖谦:《近思录》卷 13,《朱子全书》第 13 册,第 279 页。
④ 朱熹、吕祖谦:《近思录》卷 13,《朱子全书》第 13 册,第 278—279 页。
⑤ 朱汉民:《玄学与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6 页。
⑥ 朱熹:《答吕伯恭》,《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三,《朱子全书》第 21 册,第 1425 页。

同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他们既没有上古圣王的王者之位,更没有他们立下的政治事功。那么,凭什么能够确认周敦颐、二程、张载可以纳入到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曾思孟的道统脉络?

其实,儒家道统思想从孔子开创之时,就主要采取以师道传承道统的形态,完全改变了道统传承的方式与路径。一方面,儒家采取以经传道的方式,孔子整理“六经”以保存三代圣王之道,但是宋儒发现,两汉以来虽然经学繁荣,但是汉儒沉溺章句训诂,经学愈发达而离道愈远。所以宋儒坚持认为,圣人之道不在经学的章句训诂,而在儒者的德性修养与精神气象,这一德性与气象主要存在于孔曾思孟的人格与学问之中,正如《近思录》引程颢之说:“曾子传圣人学,其德后来不可测,安知其不至圣人?”“传经为难。如圣人之后才百年,传之已差。圣人之学,若非子思、孟子,则几乎息矣”①。《近思录》卷十四共二十六条,其内容虽然涉及从尧舜禹汤到文武周公的王道道统,但是其重点却是周张二程的师道之传。尽管朱熹、吕祖谦在《近思录》中并没有以“道统”一词概括其这一卷的思想,但是,编者选择了周敦颐、二程、张载等人的“圣贤气象”,恰恰体现了朱熹强调的道统论思想。譬如,《近思录》卷十四中津津乐道的是:

> 周茂叔胸中洒然,如光风霁月。②
>
> 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气,盎于面背,乐易多恕,终日怡悦,立之从先生三十年,未尝见其忿厉之容。③
>
> 学者有问,多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而后已,闻者莫不动心有进。④

这里选取北宋道学家表现出来的“圣贤气象”,均是社会责任与个人自在、忧患意识与闲适心态、道义情怀与洒落胸襟相结合的内圣精神气象。道学家追求这一精神境界的问题意识促使他们推动道学思想的理论建构,这是道学得以创建的精神动力。

前面已经指出,道学体系建构需要两个维度:历史的维度与理论的维度。《伊洛渊源录》从历史维度系统展示了宋代道学家授受脉络的学统,《近思录》从理论维度系统化道学思想而建构了天人之道、心性工夫、礼乐刑政、超然境界的道学体系。其实,《近思录》最后一卷,就是将两个维度统一起来,通过“圣贤气象”连接了道学体系与道统谱系。在此之前,朱熹为确立道统谱系已经独立编撰了《伊洛渊源录》,但是那一本书主要是道学群体的个人传记,而没有充分资料展示道学家的学术思想。而《近思录》不仅选录了周敦颐、二程、张载的重要学术观点,使学者能够更加完整学习、理解道学的系统思想,而且所选的人物与思想均合乎南宋道学群体关于道学家的思想共识。所以,从学术史的角度,只有将《伊洛渊源录》与《近思录》结合起来,才能够看作是完整建构起宋代道学的学案。南宋淳祐戊申年叶采编《近思录集解》时,以朱熹的道统论为视角,对这一卷的思想内容作了概括,他说:

> 此卷论圣贤相传之统,而诸子附焉。断自唐虞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道统相传,至于孔子。孔子传之颜、曾,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遂无传焉。于是楚有荀卿,汉有毛苌、董仲舒、扬雄、诸葛亮,隋有王通,唐有韩愈,虽未能传斯道之统,然其立言立事有补于世教,皆所当考也。逮于宋朝,人文再辟,则周子唱之,二程子、张子推广之,而圣学复明,道统复续,故备著之。⑤

可见,《近思录》与《伊洛渊源录》的道统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叶采根据朱熹的道统观念,肯定这一卷的内容就是“论圣贤相传之统”,其重点就是《近思录》中周敦颐、二程、张载的思想贡献即“圣学复明,道统

---

① 朱熹、吕祖谦:《近思录》卷 14,《朱子全书》第 13 册,第 282 页。
② 朱熹、吕祖谦:《近思录》卷 14,《朱子全书》第 13 册,第 284 页。
③ 朱熹、吕祖谦:《近思录》卷 14,《朱子全书》第 13 册,第 286 页。
④ 朱熹、吕祖谦:《近思录》卷 14,《朱子全书》第 13 册,第 287 页。
⑤ 朱熹、吕祖谦编,叶采集解:《近思录集解》卷 14。《朱子学文献大系·历代朱子学著述丛刊·近思录专辑》第一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24 页。

复续”。应该说,叶采以朱熹的道统观念解释《近思录》卷十四的内容,准确表达了编撰者朱熹的思想。

《近思录》所确立的道学体系,对道学建构有重要开拓意义。后来学界编辑《朱子语类》《性理大全》《朱子大全》依据的体系化道学,其实均可以源于《近思录》,体现出《近思录》道学体系对后世的深刻影响。

The System of theStudy of the Way and its Id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n 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

Zhu Hanmin

(*Yuelu Academy*,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 (《近思录》) was written by Zhu Xi (朱熹) in an attempt to construct a system of the Study of the Way(道学) through a genealogical succession of the Way (道统). This book is composed of two parts: the Substance of the Way (道之体) and the Function of the Way (体之用), which were integrated into the system of the Study of the Way, in the sense of “the Way of inner sageliness and outer kingliness”(内圣外王之道).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book contains Zhu Xi's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the Substance of the Way in a metaphysical sense, while its last chapter describes the metaphysically spiritual realm in which the sages and men of virtue attained the Way. Both the first and the last chapters are mutually interwoven and interrelated with “the Substance of the Way”, embodying the academic interests and id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udy of the Way. About a dozen of chapters in the middle part of this book are related to “the Function of the Way”, and concerned with the skills to attain the Way (行道工夫) in the physical sense (形而下意义), and also concerned with rites, music, justice and administration (礼乐刑政), thus providing a fairly comprehensive summary of the Function of the Study of the Way. The system of the Study of the Way established in *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 was of great pioneering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tudy of the Way, and produced a historical influence upon Zhu Xi's followers who compiled *the Topically Arranged Conversations of Master Zhu Xi* (朱子语类), *the Great Compendium of Nature and Principle* (性理大全), and *the Complete Works of Master Zhu Xi* (《朱子大全》).

Key words: Zhu Xi (朱熹); *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 (《近思录》); system of the Study of the Way; genealogical succession of the Way

(责任编辑　　杨伊佳)